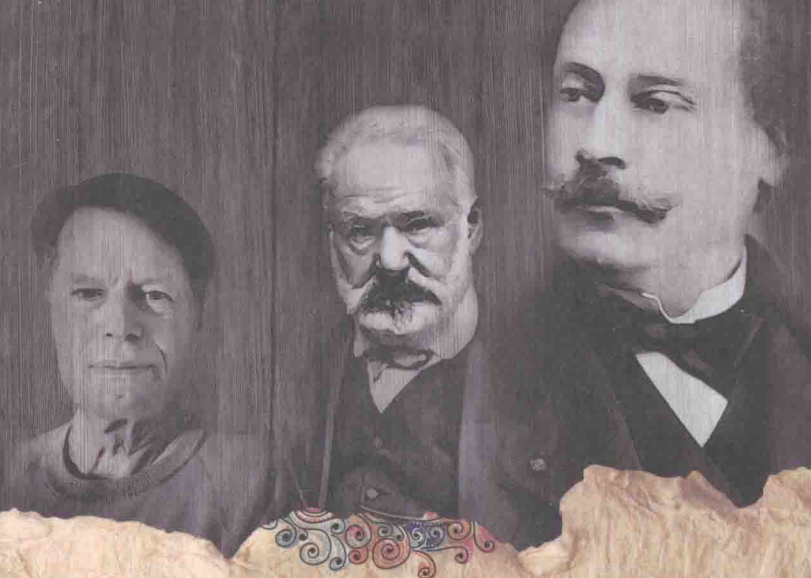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法语文学卷

LES TRADUCTEURS PARLENT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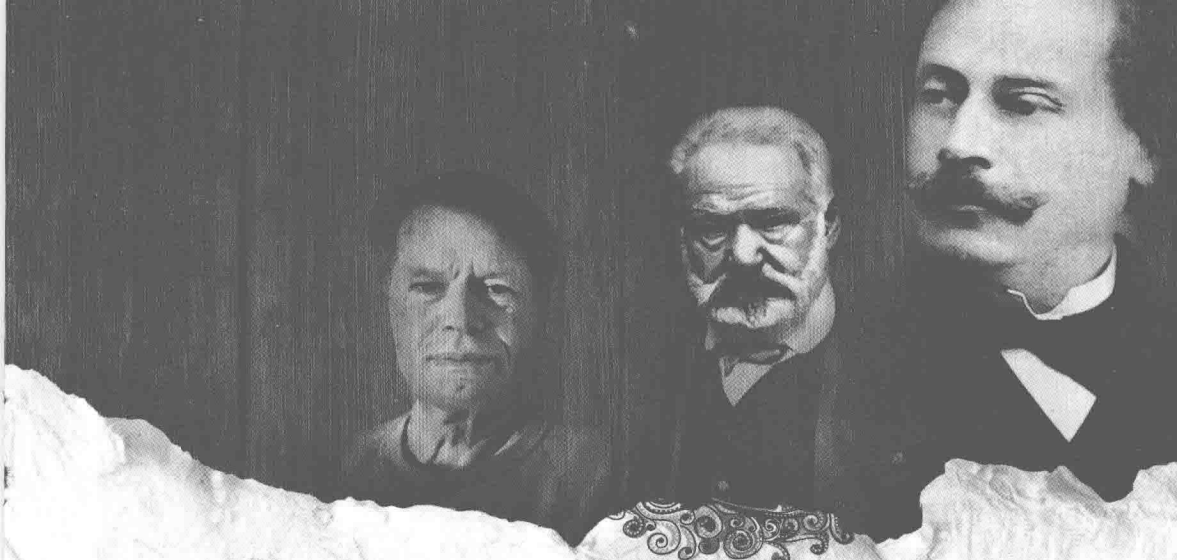
从《茶花女》 到《流浪的星星》

启蒙的光辉与人性的力量

*De la Dame aux Camélias à
l'Etoile errante*

L'éclat des Lumières et la force de l'humanité

许钧 施雪莹 主编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法荷文学卷

LES TRADUCTEURS PARLENT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从《茶花女》 到《流浪的星星》

启蒙的光辉与人性的力量

*De la Dame aux Camélias à
l'Etoile errante*

L'éclat des Lumières et la force de l'humanité

许钧 施雪莹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茶花女》到《流浪的星星》：启蒙的光辉与人性的力量 / 许钧，施雪莹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1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ISBN 978-7-5151-0548-2

I . ①从… II . ①许… ②施… III . ①法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 ① H325-9 ②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147 号

从《茶花女》到《流浪的星星》

——启蒙的光辉与人性的力量

主 编 许 钧 施雪莹
责任编辑 刘 荔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48-2
定 价 58.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从《茶花女》到《流浪的星星》

法语文学卷

前 言



许 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林一安先生来电，说出版社有意推出一套翻译家谈文学翻译的书，涉及国内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文学翻译界，邀我选编一卷法语文学翻译家谈文学翻译的文章，我欣然答应，而且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与我的研究生施雪莹一起，搜集我国法语文学翻译界的前辈译家与目前在译界仍然非常活跃的一批中青年翻译家讨论文学翻译的文章。

季羨林先生曾说过：“翻译作用大矣哉。”在译介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方面，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人士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和新世纪里，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和别的语种的同行一起，实际上担负着对整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选择、翻译与传播的工作。法国文学渊远流长，流派纷呈，在世界文学之林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一方面对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法国

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译介，无论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市民文学，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七星诗社，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还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或是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无一不纳入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二十世纪和新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慢慢打开，中外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有机会与法国文学界、出版界进行直接的交流甚至对话，得以不断加深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法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令中国外国文学界瞩目的成绩。

我国对法国文学的译介，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都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的同行所瞩目，这是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求真求美默默耕耘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们怀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为丰富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前辈翻译家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李青崖、赵少侯、黎烈文、盛澄华、穆木天、金满成、傅雷、焦菊隐、罗大冈、闻家驷、李健吾、罗玉君、陈占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老翻译家继续默默耕耘，翻译介绍法国文学作品，提供精神食粮，如郑永慧、许渊冲、郝运、沈宝基、罗洛等。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翻译的春天，在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当代法国文学的译介中，出现了一批出色的翻译家，像北京的柳鸣九、徐继曾、桂裕芳、施康强、郭宏安、罗新璋、沈志明、袁树仁、吴岳添、谭立德、罗芃、陈筱卿、葛雷等，上海的王道乾、林秀清、郑克鲁、王振孙、徐和瑾、马振骋、周克希、何敬业等，南京的徐知免、陈宗宝、汪文漪、冯汉津、陆秉慧、王殿忠、韩沪麟、钱林森等，武汉的江伙生、张泽乾、周国强等，西安的张成柱，广州的罗国林、黄建华、程依荣、朗维忠等，广西的黄天源，长沙的余协斌，洛阳的潘丽珍等，翻译介绍了大量的法国诗歌、戏剧、小说作品以及文艺理论著作。在近十几年来，在前辈翻译家的积极影响下，经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一批年轻的翻译家在健康成长，像王东亮、秦海鹰、余中先、董强、李焰明、树才、杜青钢、罗国祥、曹德明、朱延生、边芹、杨令飞、管筱明、胡小跃、户思社、金龙格、张新木、刘成富、袁筱一、袁莉、黄荭等，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看好。

我们这次选编法语文学翻译家谈翻译的文集，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现历史、总结经验。根据该原则，我们在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文章中，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论翻译的文字。在选编中，我们发现，有不少翻译家翻译经验非常丰富，但却很少留下谈翻译的文字，加上我们的工作难免有疏忽，所以入编本集的翻译家为数并不多。另外，因为篇幅的限制，虽然有的翻译家对文学翻译有精深的研究，就文学翻译发表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见解，但我们原则上每位翻译家只选一篇文章。

从目前入编本集的文章看，内容非常丰富。翻译家们结合文学名著的翻译，就翻译的本质、译者的立场、翻译的障碍、翻译方法与标准、翻译的局限、译者的修养等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翻译，全面认识翻译的作用。

在我看来，翻译是历史的奇遇。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遇到一个优秀的翻译家，那是他的幸运，如福楼拜遇到了李健吾，罗曼·罗兰遇到了傅雷，杜拉斯遇到了王道乾。多亏这些优秀的翻译家的努力，法国文学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延伸其生命。在此，我要向所有翻译家致敬！

2015年3月20日

于南京大学树华楼

目 录



- 许 钧 | 前言 1
- 赵少侯 | 我对翻译批评的意见 1
- 梁宗岱 | 译事琐话 5
- 焦菊隐 | 论直译——写给一个初学翻译的青年同志 7
- 闻家驷 | 是直译还是意译 19
- 李健吾 | 我走过的翻译道路 21
- 傅 雷 | 论文学翻译书 25
- 沈宝基 | 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27
- 罗大冈 | 漫谈文学翻译 34
- 赵瑞蕻 | 译书漫忆——关于《红与黑》的翻译及其他 39
- 郑永慧 | 文学翻译的基本功 57
- 许渊冲 | 谈重译——兼评许钧 62
- 郝 运 |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翻译——致许钧 71
- 罗 洛 | 译诗断想 74

目 录



- 桂裕芳 | 法语文学翻译与教学心得谈 81
- 陈宗宝 | 法国文学在我国的翻译 91
- 柳鸣九 | 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99
- 罗新璋 | 释“译作” 114
- 王殿忠 | 翻译风格三议 121
- 钱林森 | 傅雷翻译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作家 130
- 韩沪麟 | 从编辑角度漫谈文学翻译 135
- 郑克鲁 | 翻译风格小议 138
- 徐和瑾 | 翻译是一种阅读 140
- 张成柱 | 谈罗新璋译的《红与黑》——兼谈罗新璋的翻译艺术 145
- 罗国林 | 风格与译风 153
- 施康强 | 何妨各行其道 159
- 周克希 | 译书故事 163
- 郭宏安 | 我译《红与黑》 172

- 黄天源 | 文学翻译亦应重形似 181
- 吴岳添 | 百年回顾——法国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 188
- 罗 芃 | “信”与文体 195
- 余协斌 | 澄清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中的几个概念 198
- 许 钧 |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205
- 余中先 | 我译法国新小说 216
- 胡小跃 | 翻译家任重道远 220
- 树 才 | 什么是一首译诗? ——以阿波利奈尔《米拉波桥》为例 224
- 金龙格 | 漫漫翻译路 239
- 袁筱一 | “不可译”或“再创造” 244

赵少侯(1899—1978),浙江杭州人。文学翻译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系,留校任教,历任中法大学、上海劳动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教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法文编辑,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介了多部莫里哀的喜剧,如《伪君子》《悭吝人》等。另译有《山大王》《法郎士短篇小说集》《海的沉默》《杜卡莱先生》《柏林之围》《羊脂球》等。

我对翻译批评的意见



翻译批评在我国至少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五四时代,就有所谓“芟臭草”的运动。意思是芟除翻译园地里有害谷蔬的野草。批评者一旦发现了某本书中的错误,大都以嬉笑怒骂、尖酸刻薄的口吻来作批评,气焰之高,确难令对方忍受。因此被批评者也很少有公开承认错误的;不是反唇相讥,便是置之不理。在一九三五年,南京曾发行一种《图书评论》,仿佛支持了两年。被批评的书籍已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但评者自评,译者自能找到书店,照常再版三版地继续印卖他那早应毁版的书。

现在的翻译同志们的作风与以往确实有着基本的不同。这是由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了解批评的目的是为改进整个翻译事业。批评者既不像先前那样盛气凌人,被批评者也乐于接受批评意见。在以往的六期《翻译通报》里,我们已遇到为数不少的这种良好作风的实例。这实在值得我们欣幸。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翻译批评是在一种有前途的环境里发展着。凡是爱护翻译事业的工作同志都应该小心翼翼地培植,巩固这个良好的基础。

翻译批评问题已由董秋思同志（在本刊四期）和焦菊隐同志（在本刊六期）做了有系统的研究。此外其他同志也不断在本刊发表了一些零星意见。本文大部分是由于得了各同志的启示而写成的，拟分三部分来谈：（一）批评应先从何处下手；（二）批评者的态度；（三）批评的标准。

（一）批评应先从何处下手

说明白点，就是应先批评哪些书？“从经典文选及学习参考的理论书籍入手”，这几乎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原则了。但最近在社会上却听到了两种与此相反的反应：（甲）有人认为目前译成中文的此类书籍，在社会上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还在继续起作用。对这些书加以批评，会招致读者对他们的轻视和怀疑，而影响了广大人民的学习。（乙）有些人则想到这些经典著作和有关学习的理论书籍的译者们在提高人民政治水平方面，已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对革命已有过不可埋没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已基本胜利的今日，对他们只应有尊重，不该再挑剔他们文章中的小毛病，打击他们的翻译情绪。这两种看法虽然仅是少数人的主张，但也有加以解释的必要。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修养上起了提高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因为这些书籍的影响广泛，我们才应该精益求精。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群策群力，将所有的经典著作校阅一遍，看看是否尚有译错或译的不妥的地方残留在那里。若有错误，即使是印刷的错误，也应该指出。任何人都会明白，译一部几十万言的巨书，精神始终贯注，从头至尾没有一点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这些书中发现一些错误或粗枝大叶的地方，并不算稀奇。所以这些错误的指出并不意味着译者的能力不够或者责任心不强。因此对这些书籍的批评，并不能当作对译者们的打击。聪明正直的译者正应欢迎这种批评。一般思想正确的读者也应该了解，批评只是指出书中已有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全书的译文都要不得。相反地，经过了批评的书，才是一本健全无瑕、可以放心研究的书。

（二）批评者的态度

批评者心目中应时时刻刻存在为广大读者服务的目的。为什么对于译文的错误，必须加以揭发？那是因为这个错误，即使是很小，也能使读者蒙受损害。为什么对于好的译文要加以表扬？那是因为可以使每一个读者放心大胆地读这本书，他可以通过这本书不折不扣地获得原著可能给予的知识。根据这个

出发点，我们在批评时便可以把一切有益于批评本身的意见置之不顾而勇敢地进行我们的工作。批评者的目标只应是一个：忠于原文的译文要加以介绍，不忠于原文的译文要无情地批评，并提出具体的修正。至于译者的社会地位、译者的工作情况，都不应成为考虑的中心。译者是专业或者是兼业或是爱美者，译者是在闲适的环境下或是万事猬集、公私交迫的情形下工作，译者是多年从事翻译的老手或是有志从事翻译而正在学习的新进，我们都用不着关心。这些条件不能增加或减低译文的价值。兼业和爱美者译错了文章，他们所给读者的损害并不小于专业者。拖了精疲力尽的身体在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去搞翻译工作，弄出许多错误的可能性当然比较大一些，但也无权要求读者或批评者照顾这些情况，而不指出或少指出存留在他们书中的错误或欠妥的地方。翻译老手的译品中的错误固然要批评，新进翻译者的试作，如有毛病，也不能因为他们尚在学习，加以原谅而不予指摘。总之一句话，一切是要对人民负责的。任何人不能强调任何个人的特殊条件，而减轻他损害广大读者利益的责任。这样一种严厉的态度，会不会妨害了此后翻译的量的发展呢？会不会使有志于翻译的青年束手不前呢？我的答复是：我们不能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违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不能为照顾片面的利益而忽略了全体的利益，一本完善的译本胜过十本似是而非的译本。至于正在学习翻译的新进同志，我们当然非常重视他们这种志愿，但在他们对于自己的译品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希望他们不要亟亟于出版。

（三）批评的标准

译书的标准应就所译书籍的题材和性质而有所区别，所以翻译批评的标准也应随之而不同：

（甲）译科学书籍以能说清原委、明白晓畅为主要条件。科学书籍的译文主要的任务不在使读者知道原文是如何说法，而是使他明白原文要说的事物，要解释的理论。因此科学书籍译本的批评便不应强调某句译错或某句漏译，而是要审查：原文想使读者了解的事物和理论，译文是否能用原来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完全精确地重述出来。严几道译《天演论》，在译完每一段后，加上一段解释，对当时的读者有很大的帮助。那是一个未可厚非的方法。

（乙）译社会科学及政治理论的书籍，则不仅要使读者了解原文所说的事物理论，同时也要尽量照顾到原文字句和组织。因为语文的结构会影响文字力量的强弱的。有力量的文字，说服力便强大。举个例子来说，斯大林《论中国革

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为宣传员而作的提纲)第三节里,前两段都以“蒋介石底叛变是表示……”作起句;第三段四句,则每段以“这就是说……”为开编;最后四段则依次冠以“由此可知”,“其次,由此可知”,“再其次,由此可知”,“末了,由此可知”。这样的译法,无疑的忠实地保持了原文的语气,因此中文译文也显出十分有力。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保持原文语气的需要:最近刘少奇同志五一劳动节报告的法文译本,却常常把与原文气力充沛的句子译成稀松无力的句子。譬如把“我们庆祝这一个最大的胜利!庆祝一九五〇年劳动节!庆祝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三个,一句比一句更有力,更响亮的句子,译成一句比一句更泄劲的句子。这三句被译成“Nous célébrons cette victoire la plus grandiose! Nous célébrons la Journée du 1er Mai de 1950! Nous célébrons la lib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chinois!”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会场上,这三句话是怎样用号召的语气向听众喊出,但译成了法文,便变为直叙现状的口气,不但无力,却令读者不明白为什么在此处突然会有这三句话。虽然句末有感叹符号,也于事无补。如把三个 nous 字取消,把句子改成命令式,原文的语气便适当地保存了。

根据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批评这种书籍的译本时,固不能以中外文的字句相符便认为满意,我们还应注意原文所具有的感动力是否已经被重现在译文里。在译文里,读者是否也能体验到原著者的理直气壮的不得挡的锋芒。

(丙)译文艺书籍,则除了忠实精确地转述了原文的意义外,原文的语气、笔调、风格,甚至于神韵,都应尽可能地保持在译文里,这样说很困难,但“取法乎上”不才“仅得其中”吗?所以标准不妨定得高一点,我以为从文艺书籍的译文里,我们不仅企图丰富我们的思想方法,文艺技巧,我们还希图丰富我们的语言。因此在文艺书籍的翻译里,我主张直译是最好的方法。一长句分成几个短句,或把主句与副句拆开来译成两句,读起来固然方便,理解上,也比较容易,但原文的精神往往因之受了损失。我们译文艺书籍,若能使读者觉得迭更司的笔调和有“法国迭更司”之称的铎德的笔致有基本的不同,法郎士的幽默与萧伯纳的幽默是两种幽默,那么翻译文艺书籍的任务是毫无缺陷地完成了。

梁宗岱 (1903—1983), 广东新会人。诗人, 文学翻译家, 笔名岳泰。1923年进入广州岭南大学, 1924年赴欧, 在法国巴黎大学接触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 向中国译介法国象征派大师保罗·瓦雷里的作品。随后在瑞士、德国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其间于1934年东渡日本一年。1970年起执教于广州外语学院。著有诗集《晚祷》, 词集《芦笛风》, 论著《诗与真》, 译诗《水仙辞》《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译文《罗丹》和《浮士德》(上)等。

译事琐话



一九二五年, 我在欧洲留学期间, 曾尝试把中国古典诗歌, 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诗及晋代诗人陶潜的诗译为法文。当时, 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 (1871—1945) 曾为我的法译《陶潜诗选》写序, 称赞“虽然是中国人, 并且学了我们的文字还不久, 梁宗岱先生在他的诗与谈话中, 仿佛不仅深谙, 而且饕餮这些颇特殊的精微。他运用和谈论起来都怪得当的。”

一九二七年, 我利用课余翻译了瓦雷里的长诗《水仙辞》, 把它寄回国内, 刊登于《小说月报》。一九三〇年,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这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大师的作品。

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写信给我, 这样评价我翻译的陶潜诗: “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 并且由于这些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习! 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 “我已经收到你那精美的《陶潜诗选》, 我衷心感谢你。这是一部

杰作，从各方面看：灵感、移译和版本。”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旅居日本时，把自己近年来的译作收成集出版，用歌德的名诗《流浪者之夜歌》的首句“一切的峰顶”为题，集中收录了歌德、波特莱尔、魏尔仑、瓦雷里、里尔克、尼采、雪莱、勃莱克的部分诗作。

我自认为自己的翻译态度是严肃的。我认为，翻译是再创作，作品首先必须在译者心中引起深沉隽永的共鸣，译者和作者的心灵达到融洽无间，然后方能谈得上用精湛的语言技巧去再现作品的风采。我在《一切的峰顶》一书的序言中写过：“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我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说，自己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

至于译笔，大体上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我在翻译瓦雷里、波特莱尔、魏尔仑的作品中，一一做到了再现作品的意蕴和风格。香港评论家璧华曾评说：“这点，只有杰出的诗歌翻译家方能做到。在五四运动以来，除梁氏外仅有朱湘、戴望舒、卞之琳等少数几个能达到这个水准。正是因此，梁氏的寥寥几十首译作，对诗歌翻译工作者来说，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任教之余，继续从事翻译，曾从德文直接翻译了《浮士德》（上卷），已于去年交付出版社。我译的莎士比亚商籁（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的译文已选入《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诗译文面世后，海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出版单行本。据悉，四川人民出版社已把此书列入出版计划。《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专号》一九八一年第七期曾发表钱兆明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一文，其中对我的莎诗译本作了这样的评价：“梁译的特色是行字典雅、文笔流畅，既求忠实于原文，又求形式对称，译得好时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韵到。”“人常说格律诗难写，我看按原格律译格律诗更难。凭莎氏之才气写一百五十四首商籁尚且有几首走了点样（有论者谓此莎氏故意之笔），梁宗岱竟用同一格律译其全诗，其中一半形式和涵义都兼顾得可以，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了。”

我译歌德的《浮士德》（上集），本来早就已译好了的，不料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把我的全部著作烧光，所以只好从头再译。《蒙田试笔》我译了二十多万字，被烧光，现在无法再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前年刚译完上卷，我就病倒了。现在，我七十九岁，卧病在床，计划在病愈后完成《浮士德》的下卷。

（原收入巴金等著，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焦菊隐 (1905—1975)，天津人。戏剧艺术家，戏剧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原名焦承志。笔名居颖、居尹、亮侑，艺名菊影，后自改为菊隐。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5年留学法国，1937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总导演，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执导了《龙须沟》《茶馆》《蔡文姬》等30多部话剧，著有《导演、作家、作品》《导演的艺术创造》等。译有左拉的《娜娜》《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丹钦科的《文艺、戏剧、生活》以及契诃夫的全部剧本等。

论直译

——写给一个初学翻译的青年同志



你叫我给直译下一个定义。我没有这种能力。凡事都很难用三言五语说得明白，翻译方法更是如此。我们大家也正为了寻求一个工作的指南，都在摸索着。我只能就着你在初次工作里所接触到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经验和不成熟的意见，供作参考。

你向我抱怨，说你读过一篇译文，里面有若干句子，叫你百思不得其解。等你去对照原文，才发现那是误译。误译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的是文法没有搞清楚，才曲解了原意。文法是字与字，字群与字群的关系上的一些规律；凡是不能熟练地掌握这些规律的，势必把意思弄左。从事翻译的人，首先不可轻视文法。它固然是机械，可也是一把打开思想与情绪宝库的好钥匙。